

「新的文化中心」的建設： 香港《立報·言林》與葉靈鳳的文學翻譯 (1938–1941)

張蕾 (Lei Zhang)

中國 蘇州大學

摘要

《立報》1938年在香港發行，1941年停刊。葉靈鳳是香港《立報》副刊《言林》的編輯，在他的努力下，《言林》顯示出「世界性」特徵。葉靈鳳通過連載翻譯作品支撐起了《言林》的版面構架。從《紅翼東飛》到《狐》，葉靈鳳貢獻給《言林》的一系列譯作，既具有現實意義，也體現出明顯的文學取向。作為新文學家，葉靈鳳翻譯的價值超越了翻譯本身。隨著內地作家南來，香港在戰時成為新文化和新文學的一個中心。《言林》對新文學在香港的開展起到不容忽視的作用。如果考慮到《言林》刊載文字的三類題材內容，那麼國內文學的報導、國外作品的引入都與香港本地文學的建設連在了一起。葉靈鳳的翻譯照應了新文學建設時期對西方作家和文學翻譯的倚重。《早戀》等《言林》的優秀譯作，成為新文學創作的示範，融入了香港的文學歷史。

Abstract

Lih Pao was published in Hong Kong in 1938 and ceased publication in 1941. Ye Lingfeng was the editor of *Yan Lin*, a supplement of Hong Kong's *Lih Pao*. With his efforts, *Yan Lin* show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smopolitan." Ye Lingfeng supported the layout of *Yan Lin* through serial translation works. From *Red Wings Fly East* to *The Fox*, Ye Lingfeng contributed a series of translations to *Yan Lin*, which not only ha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but also reflected the obvious literary

orientation. As a New Literature writer, Ye Lingfeng's translation value goes beyond the translation itself. With mainland writers coming south, Hong Kong became a center of New Culture and New Literature during the war. *Yan Lin*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New Literature in Hong Kong. If we consider the three types of subject matter of the articles published in *Yan Lin*, the reporting of domestic literature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foreign works are connected with the construction of local literature in Hong Kong. Ye Lingfeng's translation reflects the reliance on Western writers and literary translation in the period of New Literature construction. The excellent translations of *Yan Lin* such as *Early Love* have become a model of New Literary creation and integrate into the literary history of Hong Kong.

關鍵詞

《立報·言林》、葉靈鳳、文學翻譯、香港、抗戰

《立報》日刊，1935年9月20日由著名報業家成舍我（1898–1991）等人在上海創辦，1937年11月25日起停刊。1938年4月1日開始在香港發行，今所能查見的香港《立報》最後一期出刊於1941年12月13日。1945年10月1日《立報》復刊於上海，1949年4月30日終刊。¹「《立報》的出版，不僅在上海，而且在我國新聞事業史上，佔有重要地位，它標誌我國小報發展的里程碑。它的辦報方針和革新精神都在我國新聞界產生了一定影響」（馬光仁 1996，774）。《立報》是小型報紙，四個版面。²和一般小報偏重娛樂、趣味不同，《立報》更注重新聞性、時事性和社會性，把小報辦成了大報的格局。「創刊不到半年銷量達到10萬份，最高時達20萬份，『打破自有日報以來的銷售最高記錄』（劉艷鳳 2009，116–120）。《立報》的成功，使它因上海淪陷而停刊之後，能夠在香港獲得重生。

對《立報》的研究主要集中於1935年至1937年的上海時期，1945年之後的《立報》也有論文予以專門研究，³而《立報》的香港時期則研究較少。一些香港史的著作中會提及《立報》，但較少深入研究，乃至對香港《立報》停刊的具體時間語焉不詳。《報刊香港：歷史語境與文學場域》一書對《立報》有所關注，只不過主要述及《立報》的一個副刊《言林》（趙稀方 2019，118–120）。《諦聽雜音：報紙副刊與香港文學生產（1930–1960年代）》一書論述了《立報》的兩個副刊《小茶館》和《言林》，這是迄今對《立報》副刊較為專門的研究（樊善標 2019）。⁴《立報》的一大特色是四個版面的報紙設有三個副刊。《言林》副刊在第二版，第三版的副刊是《花果山》，第四版的副刊是《點心》，後改名《小茶館》。三個副刊的傾向稍有不同。《言林》刊登的文章和作品偏重於新文化和新文學，《花果山》具有市民性和趣味性，《小茶館》更面向社會下層民眾。由這三個副刊所居版面，可知其間略有輕重。香港《立報》延續了這三個副刊的格局，並聘請茅盾（1896–1981）擔任《言林》主編。之前在上海，《言林》的編輯是創立復旦大學新聞專業的新文學家謝六逸（1898–1945），《言林》在他的編輯下十分有聲色。到香港，茅盾接替謝六逸，《言林》因茅盾的聲望而備受關注。

盧瑋鑾評論茅盾編輯的《言林》道：「茅盾自《立報》創刊便擔任《言林》副刊編輯工作，一直到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日離開香港赴新疆為止。在任期間，《言林》的確使香港讀者耳目一新，也顯示了編者的見聞廣博，及約稿範圍廣泛」（盧瑋鑾 1987b，146）。《報刊香港：歷史語境與文學場域》一書述及《立報》止於茅盾結束《言林》編務離開香港，之後《立報》如何，付之闕如。《言林》與香港《立報》相始終，茅盾之後，《言林》的編者是誰？1939年1月7日，《言林》刊登了一則〈編者啟事〉，署「葉靈鳳啟」（葉靈鳳 1939a）。葉靈鳳（1905–1975）編輯《言林》的時間超過了茅盾和謝六逸，讓《言林》在戰時的香港發揮出重要作用。

關於葉靈鳳，研究者在談到他的後半生時，基本放過了他對《言林》的編輯貢獻。例如絲韋在《葉靈鳳的後半生》中沒有述及編輯《言林》之事（絲韋 2017，442–450）。慕容羽軍《葉靈鳳融入香港》只是提到：葉靈鳳「跑到香港來，首先在《立報》落腳，隨後轉了幾轉，由《國民日報》轉到《星島日報》，就此安定下來，成了《星島》副刊的靈魂」（慕容羽軍 2013，83）。《葉靈鳳傳》也只說：「除了『文協』的工作，葉靈鳳還曾接替茅盾主編《立報·言林》，經他的手刊發了許多緊扣『抗日建國』精神、使香港文壇面目一新的作品。他自己也在《立報·言林》和戴望舒主編的《星島日報》副刊《星座》上發表了一系列鼓動抗日熱情的雜感和書評」（李廣宇 2003，132）。葉靈鳳編輯《言林》的具體情況如何？他在《言林》上發表過哪些文章？都可作進一步查考。值得注意的是，樊善標對葉靈鳳編輯《言林》有過論述，可惜只選取了《言林》上的部分文章作「側面觀察」（樊善標 2019，144）。鄭可怡對葉靈鳳發表在《言林》上的兩部翻譯小說有專門研究，並從「政治審查與文學生產」的角度論述了葉靈鳳主編《言林》的「內在抵抗」策略。⁵確實，葉靈鳳發表在《言林》上的主要作品是小說、散文等的文學翻譯。以往對葉靈鳳的研究大都關注於他的小說創作和散文書話，或是他對於香港的史地研究和木刻愛好，很少涉及他的翻譯寫作。鄭可怡對葉靈鳳翻譯的《紅翼東飛》和《火線下》的專門研究，可為研究葉靈鳳和《言林》提供一種思路。而葉靈鳳在《言林》上多量的翻譯也對當時香港文壇建設起到重要作用。

（一）葉靈鳳與《立報·言林》

香港《立報》1938年4月1日出刊，報頭上註明「發行人薩空了」。薩空了（1907–1988）1935年11月被成舍我動員至上海《立報》工作，一開始編輯副刊《小茶館》，1936年9月開始擔任《立報》總編輯兼經理。上海淪陷，薩空了暫居香港。他回憶道：「適值此時廖承志、潘

漢年同志都在香港，擔任中國共產黨香港辦事處的工作，在皇后大道中開著一爿公司作為掩護。廖承志同志對《立報》一向很支持，認為這張報紙辦得好。潘漢年同志是我在上海時，通過胡愈之同志介紹認識的，也一直很關心《立報》。因此，他們得知此事後，就以中國共產黨的名義投資三千元港幣，讓我把《立報》再辦起來」（薩空了 1985，28-29）。所以香港《立報》具有左翼傾向，社址在皇后大道中一七五號。當時與《立報》同為南來文人主辦的香港報刊還有《星島日報》（1938）、《大公報》（1938）、《華商報》（1941）等，都「利用香港的文化空間，繼續抗戰宣傳的工作」（陳智德 2016，64）。《立報》是抗戰時期南來文人在香港主辦的最早的期刊之一。

薩空了在香港《立報》擔任總編輯和總經理，當時成舍我在武漢，並不知道《立報》在香港籌辦的具體情況。薩空了回憶：成舍我到香港，「我們兩人一交談，才發現，我們兩人各自向不同的方向在前進。成舍我知道我接受共產黨的錢辦報後，半開玩笑半正經地說：這也不錯，你拿共產黨的錢，我和國民黨交往，正好左右逢源」。但「辦一張報紙，決不可能容納兩種不同的立場和觀點，我和成舍我已不能再合作下去了」（薩空了 1985，37）。1938年9月，薩空了離開《立報》去新疆，他在《立報》的工作由吳範寰（1897-1978）接替，但《立報》發行人還是署「薩空了」，直到1938年12月，發行人改署「陳玉山」。1939年9月到1941年12月，發行人署「吳伯安」。吳伯安即吳範寰，曾在成舍我主辦的《世界日報》擔任經理和編輯。吳範寰接替薩空了，淡化了《立報》的左翼色彩。

薩空了請茅盾主編副刊《言林》。1938年2月茅盾到香港，12月20日離港赴新疆後，《言林》暫由杜埃（1914-1993）編輯。1939年1月7日葉靈鳳在《言林》上發表〈編者啟事〉，全文道：「這一塊小小的園地，自即日起暫由鄙人承乏，希望言林經常寫稿諸君，能繼續多多賜稿，以便保持茅盾先生留下的這一份光榮的傳統。稿作請徑寄立報言林編輯部，毋寫個人姓名，以免稽遲」（葉靈鳳 1939a，第2

版)。同期，葉靈鳳發表〈摩登半間堂〉一文以南宋權臣賈似道的劣跡來諷刺現實的賣國投降者。他另刊登了風沙〈哀周作人〉一文與〈摩登半間堂〉相呼應。這一期還有林林(1910–2011)〈無章的詩話(中)〉評俄國詩人葉賽甯，呼籲「在持久戰中，我們要肅清悲觀的葉賽甯主義」(林林 1939)。可見葉靈鳳是以堅定的抗戰態度亮相《言林》，從此他主編《言林》達兩年零五個月。

葉靈鳳也是戰時南下香港的文人之一。1937年8月《救亡日報》創刊於上海，郭沫若任社長，茅盾、葉靈鳳等人為編委，1938年1月遷到廣州，葉靈鳳也到廣州繼續編輯《救亡日報》。他在廣州工作，香港安家，常往返於兩地之間。1938年10月廣州淪陷，葉靈鳳回不了廣州，就此留在香港。上海時期，葉靈鳳已積累了豐富的辦刊經驗。他編輯《洪水》、《現代》，主編《幻洲》、《現代小說》、《戈壁》等，而其時上海《立報》的「成功經驗又對今後的小報界乃至整個新聞界產生影響，給後來者以啟迪」。「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出版的《救亡日報》，在辦報方針、編輯業務、版面設計，副刊專欄等諸方面，都吸取了《立報》的經驗並有所創新和發展」(馬光仁 1996，776)。葉靈鳳在《救亡日報》的工作有助於他在香港順利接手編輯《立報·言林》。

葉靈鳳接編《言林》，發表的〈編者啟事〉中交代了重要的一點：「保持茅盾先生留下的這一份光榮的傳統」。茅盾編《言林》有哪些「傳統」？在香港《立報·言林》第一期上，茅盾有一篇〈獻詞〉，開篇就引用謝六逸為《言林》寫的〈開場白〉：「凡對於人生社會，百般問題喜歡開口的人，都請到這裡來談天」(謝六逸 1935)。茅盾編《言林》也延續了「傳統」。不過茅盾的〈獻詞〉更加強調時代性和戰鬥性：「然而今日我中華民族正在和侵略的惡魔作殊死戰，《言林》雖小，不敢自處於戰線之外；《言林》雖說不上是什麼重兵器，然亦不甘自謂在文化戰線上它的火力是無足輕重的。它將守著它的崗位，沉著射擊」，「奏出了大時代中民族內心的蘊積」，「檢視著社會人生的毒瘡膿汁」

(茅盾 1938)。這就是茅盾編輯《言林》的宗旨和「傳統」，《言林》是戰鬥的，它關懷「大時代」，是民族心聲的表達。這一「傳統」在葉靈鳳那裡得到了延續。

葉靈鳳編輯《言林》，特別突出了「文協」的位置。1939年3月26日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召開大會，「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香港分會」宣告成立。許地山、葉靈鳳、戴望舒等人是幹事，即是文協香港分會的核心成員，葉靈鳳同時還是會報《文協》周刊編輯委員會成員。《文協》不是一份獨立刊物，而是「分別於《大公報》、《星島日報》、《珠江日報》、《申報》、《華僑日報》、《立報》、《國民日報》及《大眾日報》輪流刊載」(陳智德 2016, 65)。1939年7月24日《文協》第十三期專刊第一次出現在《立報·言林》的位置，直到1941年6月10日《立報》刊出《文協》第九十四期，《文協》在《立報》共刊出二十二期，大致貫穿葉靈鳳編輯《言林》的時期。此外《言林》還經常刊載與「文協」相關的信息或者「文協」成員的作品。葉靈鳳通過《言林》來傳達「文協」主張，宣傳抗戰，具有積極意義。葉靈鳳不是任何黨派的成員，左右兩派都有他的朋友，因此他能夠在吳範寰經營的《立報》中立足。而「文協」是抗戰時期文藝界的統一戰線組織，葉靈鳳加入「文協」，做了很多實事，使《言林》體現出一種激昂的時代色彩。

其次，茅盾編輯《言林》的稿源「除本地作者的作品外，更多國內各地作者來稿」，使《言林》「成為一個很全面的文壇交通網，使本港和國內訊息互通」(盧瑋鑾 1987b, 146)。《言林》的作者有三類：一類是暫駐香港的內地作家，如茅盾、薩空了、豐子愷、林煥平、袁水拍、胡危舟、杜埃、戴望舒、徐遲、葉秋原、黃文俞、林林等，這類作家的文章佔多數；一類是不在香港的內地作家，如巴金、老舍、艾青、田漢、卜寧、王西彥、羅洪等；還有一類是長居香港及香港本地的作家，如葉靈鳳、黃繩、李育中、劉火子、何涅江、吳其敏、鄭郁郎、林友蘭、王烙等。這些作家聚集在《言林》，形成了

《言林》的又一「傳統」即「文壇交通網」。1939年3月，葉靈鳳在《言林》發表〈留港文藝工作者的責任〉一文，文中說：「留港的文藝工作者應該一面克服身邊的困難，說服爭取工作圈外的同伴，一面利用環境負起一個運輸站的責任，將淪陷區民眾的希望和世界的同情寄回祖國，再將祖國新生的氣息傳遞到黑暗的区域和全世界」（葉靈鳳 1939b）。「文壇交通網」和「運輸站」，都強調了抗戰時期《言林》的交流功能。葉靈鳳讓「世界」參與其中，進一步發揮了這一功能。

《言林》刊載文字的內容主要分為三類，一類是國內題材，一類是香港本地題材，還有一類是國外題材。和茅盾主編時期的《言林》相比，葉靈鳳編輯的《言林》明顯增多了國外題材的分量。在「文化情報」、「文化報導」、「文化動態」、「自由文獻」、「文藝逸聞」、「國外文壇」、「歐美新書」等欄目中，多有對國外事件、人物、書刊等的報導。特別是1940年推出的「文學日曆」，所記錄的作家生卒故事都為左拉、歌德、魏爾倫、泰納、巴爾扎克等國外作家。涉及到國外，就離不開翻譯。《言林》刊有大量的翻譯文章，如黎國雄譯《托爾斯泰的兩個兒童短劇》（黎國雄 1941）、友蘭譯《時代常識大寶庫一百個有趣的問答》（友蘭 1941）等，鋪陳文藝、引進知識，豐富了《言林》的交流職能，承載傳播了更多的世界訊息。

茅盾編輯《言林》的另一個「傳統」是版面設計。《言林》每期的版面由一個長篇連載和幾則短文、詩歌構成。茅盾編《言林》，一開始就為《言林》寫了一部長篇連載小說《你往哪裡跑？》。這部小說從1938年4月1日連載到12月31日，1945年4月由重慶亞洲圖書社發行，改名《第一階段的故事》。這部小說之後，《言林》接著連載了徐遲（1914–1996）翻譯的《紀奧地利之淪亡》。這部作品節譯自《泰晤士報》記者陶格拉斯·里德（Douglas Reed）的報告文學《瘋癲的市場》。徐遲的翻譯連載了十六天，此時葉靈鳳已接編《言林》。《紀奧地利之淪亡》後，葉靈鳳連載了羅洪（1910–2017）的小說《晨光裡》和王西彥（1914–1999）的小說《班長馬其實》。之後葉靈鳳譯《紅翼東飛》開始

連載。葉靈鳳沿用茅盾編輯《言林》的版面設計，一部連載加幾則短篇的結構，且親自上陣，保證了《言林》的言說分量與閱讀興味。

葉靈鳳是視野開闊的文化人，他不僅促成《言林》「世界性」的容量，更通過翻譯連載支撐起《言林》的版面架構，葉靈鳳是《言林》長篇連載的最出力者。從1939年3月至1941年5月，葉靈鳳翻譯的作品在《言林》上連載的有：蘇聯拍夫朗訶的《紅翼東飛》、蘇聯諾爾拉的《不認識的同志》、法國巴比塞的《火線下》、譯自英文刊物的《滇緬路上》、德國布萊希特的《告密者》、蘇聯費雷爾曼的《早戀》、蘇聯高爾基的《關於契訶夫》、意大利西龍的《狐》。這些翻譯連載貫穿起《言林》的主幹，成為葉靈鳳主編《言林》時期最可矚目的成績。大部分葉靈鳳的研究者都認為，以小說聞名的葉靈鳳到香港以後基本不寫小說了，但《紅翼東飛》等翻譯小說未嘗不可以看成是葉靈鳳在小說領域的繼續實踐。只不過葉靈鳳藉助於翻譯，改換了原先的寫作路向，不再「齒白唇紅」了。⁶

1941年6月11日，葉靈鳳在《言林》上發佈〈葉靈鳳啟事〉，全文道：「本人自即日起，已辭去言林編輯職務。惠稿諸君函件上，請勿再寫個人姓名，以免延誤為要。」葉靈鳳為何要辭去《言林》編務，尚不清楚，但此時他還在《星島日報》任職，並忙於「文協」事務。6月10日《文協》最後一次刊載於《立報》，葉靈鳳在「讀書偶錄」一欄寫了〈莎氏介紹〉一文，介紹英國赫里遜(F. Harrison)的莎士比亞著作。6月11日，《言林》刊載大哀〈也算聲明〉一文，其中道：「過去的言林，它是偏重文藝」，「今後的言林，將偏重現實問題，尤其在世界大戰的演進中，我們將盡量搜集現實資料，供大家研究，參考」。《言林》要改變風格，之後刊載的「現實資料」多為《史太林的「笑臉」》、《松岡歐遊日記》之類的譯文，報導二戰人物和時事，翻譯繼續佔據重要位置。由於戰事吃緊，《立報》及《言林》的編輯都日漸迫促，終於香港陷落前夕停刊。

(二) 葉靈鳳在《言林》上的文學翻譯

作為翻譯家的葉靈鳳，並不從《立報·言林》始。在上海時期，葉靈鳳就翻譯有羅曼·羅蘭 (Romain Rolland) 《白利與露西》(現代書局 1928 年 5 月)、《新俄詩選》(《戈壁》1928 年第 3 期)、《新俄短篇小說集》(光華書局 1928 年 6 月)、顯克微支 (Henryk Sienkiewicz) 《蒙地加羅》(光華書局 1928 年 10 月)、戈恬 (T. Gautier) 《木乃伊戀史》(現代書局 1930 年 5 月)、《世界短篇傑作選》(光華書局 1930 年 5 月) 等等作品。主編《言林》之前，葉靈鳳在香港《星島日報·星座》已發表了不少翻譯文字，如翻譯紀德 (André Gide) 《英國文學行旅》(《星座》1938 年 11 月 20 日至 23 日)、亞歷山大·德契《作家在蘇聯》(《星座》1938 年 12 月 24 日至 31 日) 等。無疑，葉靈鳳具有豐富的翻譯經驗，是一位優秀的文學翻譯家。

葉靈鳳發表於《立報·言林》的翻譯作品可見表一。

表一 葉靈鳳於《立報·言林》發表的翻譯作品

譯者署名	原作者署名	譯作標題	文體	發表時間
葉靈鳳	蘇聯 拍夫朗訶	紅翼東飛	小說	1939.3.1– 1939.11.21
豐	愛德華·卡本特	自由文獻 永不停止的戰爭	散文	1939.10.14
豐	W·R·格利格	自由文獻 自由的疆界	散文	1939.10.20
豐	布倫特	自由文獻 幫助革命	日記	1939.10.21
豐	W·E·格萊斯東	自由文獻 你無法抵抗未來	散文	1939.10.22
豐	沙伽尼里	自由文獻 偉大的黎明	電影腳本	1939.10.24
豐	撒米爾·邦福特	自由文獻 獄中寄妻	詩歌	1939.10.25
豐	狄肯斯	自由文獻 關於《上流社會》	書信	1939.10.27
豐	喬治·舍爾	自由文獻 為了高貴的使命	書信	1939.10.31
豐	洛勃脫·奧曼	自由文獻 自由	自傳	1939.11.1
豐	W·F·格萊斯頓	自由文獻 群眾	散文	1939.11.1
豐	查理·麥克凱	自由文獻 手與腦的聯合	詩歌	1939.11.6
林豐	W·J·靈頓	自由文獻 自由的收穫	詩歌	1939.11.27
靈鳳	蘇聯 諾爾拉	不認識的同志	小說	1939.12.1– 1939.12.20
林豐	海涅	自由文獻 德國的燭火	散文	1939.12.14
林豐	恩斯特·寧黛	自由文獻 魔鬼和墨水	散文	1939.12.15

譯者署名	原作者署名	譯作標題	文體	發表時間
林豐	格萊斯頓	自由文獻 忍耐無用	散文	1939.12.18
林豐		書頌	宣言	1940.1.14
豐	利查·波爾遜	自由文獻 豬的問答	問答	1940.1.21
林豐	海涅	自由文獻 多麼奇怪！	散文	1940.2.2
葉靈鳳	法國 巴比塞	火線下	小說	1940.2.22– 1940.6.17
豐	柴斯拉夫斯基	真理報評中國藝展	論文	1940.3.2
林豐	傑姆·康奈爾	叛逆的歌 獻給一場支持了 七個月的鬥爭	詩歌	1940.3.6
靈鳳	蘇聯 卡費特科	一封寄給伏洛希羅夫的信	詩歌	1940.4.4
靈鳳	卞莎諾夫	高爾基與音樂	散文	1940.5.21
任訶	譯自英文刊物 《新作品》	滇緬路上	報告文學	1940.7.2– 1940.7.12
任訶	德國 布萊希特	告密者	戲劇	1940.7.17– 1940.7.25
葉靈鳳	蘇聯 費雷爾曼	早戀	小說	1940.8.21– 1941.2.1
葉靈鳳	蘇聯 高爾基	關於契訶夫	散文	1941.2.13– 1941.2.22
林豐	意大利 西龍	狐	小說	1941.5.11– 1941.5.30

表一所列是確定的葉靈鳳譯作。另一些譯文，如1939年11月28日的翻譯《詩二首》未署譯者名，1941年4月30日署「林」翻譯的《吉卜賽民歌》等，都很可能出自葉靈鳳之手。葉靈鳳是《言林》主編，他在編輯版面的空餘處補上一些翻譯文字，或不署名或隨意署個名字，都很平常，只是如今較難證實。而就這些確定的葉靈鳳譯作言之，已可見出成果豐碩。這些譯作涉及小說、詩歌、散文、戲劇、報告文學、日記、書信等多種文體，作品源自蘇聯、法國、德國、意大利等等，發表時間基本貫穿葉靈鳳編輯《言林》的始終。

2.1 《紅翼東飛》等譯作的現實意義

《紅翼東飛》的作者拍夫朗訶，今譯巴甫連柯(Petr Andreevich Pavlenko, 1899–1951)，1920年加入俄共(布)，是蘇聯小說家、編劇，獲得過斯大林獎。葉靈鳳是較早的把巴甫連柯介紹到中國的翻譯家。⁷在《紅翼東飛》連載之前，葉靈鳳寫了〈日蘇戰爭與拍夫朗訶

的《紅翼東飛》一文，介紹拍夫朗訶編劇的電影和《紅翼東飛》的主要內容。「紅翼東飛」指的是「紅軍的飛機飛集遠東」，「這是一部滲合了史料和想像的小說」（靈鳳 1939b）。小說的主要故事發生於 1930 年代，蘇聯紅軍開發遠東，日本進攻海參崴，紅軍和日軍展開激戰。小說正面描述了陸戰、空戰、海戰的場景，每場戰鬥都以一位紅軍英雄作為敘事中心，不同段落的主人公在小說整體敘事中相互關聯。小說突出了「民眾」的參戰，莫斯科民眾、中國民眾、日本民眾都加入了戰爭，以反抗日軍侵略。小說第三部寫戰爭勝利之後「片山潛城」的建設，參加建設的有蘇聯人、中國人、日本人、朝鮮人、蒙古人。很顯然，小說表現出反戰態度，並希望各國民眾獲得和平與團結。「片山潛城」得名於創建日本共產黨的領袖片山潛（1859–1933），他曾領導日本民眾反對日本侵華戰爭。小說用「片山潛」來命名一座城市，這座城市當然是被「想像」出來的，極富寓意性。在寫「片山潛城」中各國人交流時，小說特別強調了翻譯。如中國人玉山發言，「路查將他的話譯成俄語，孫勝將它們譯成朝鮮語。大須田又將他的話用日本語重述一遍。他們這樣高聲地響應玉山的話，有著一種特殊動人的效果」（拍夫朗訶著，葉靈鳳譯 1939b）。不同國家的語言在同一時空表達同一思想，在戰爭年間無疑具有震撼力量。小說記述的語言翻譯可以關聯到葉靈鳳對小說本身的翻譯，同樣也「特殊動人」。

《紅翼東飛》在《言林》上連載了二百四十天。1940 年 3 月小說由重慶大時代書局出版，4 月便出第二版，可見葉靈鳳的這部翻譯小說受到了重視。不過《言林》上的連載版和出版的單行本，有所不同。一是章節標號不同，連載版是三部，單行本分上下編；二是除細部的一些字句有所不同外，內容次序也有調整。《言林》從「在家鄉休養中的游擊隊司令王生庭」（拍夫朗訶著，葉靈鳳譯 1939a）得到戰爭開始的消息寫起，有人物有故事，直接引發了讀者的閱讀興趣。單行本則從一戰以來的世界局勢開始敘述，然後寫 1932 年開始蘇聯紅

軍駐紮開發遠東邊境，直到第三十頁才出現「王生庭」的故事。《言林》把這一部分移到小說最後，並刪去紅軍駐紮遠東的部分。就譯文而言，這段在單行本中佔了二十頁的紅軍駐紮遠東的敘述的確枯燥繁瑣，故《言林》略去了。而對世界局勢的描述體現出宏大視野，其中專門談到了中國的形勢。「可是中國的每一處地方也在準備戰鬥。她揭露了未來戰爭的輪廓。」並評論長征道：「他們這遷徙的歷史將成為這新世界歷史初期的最偉大的史詩，在一世紀之後仍將被人們緊緊的記在心頭」（拍夫朗訶著，葉靈鳳譯 1939c）。這種宏闊的歷史性評價對於處於戰爭中的中國是振奮人心的。《言林》連載的《紅翼東飛》從中國人「王生庭」開始，以振奮人心的宏大敘事結尾，對中國的報紙讀者而言更具有感染力。但葉靈鳳在談這部小說的結構時說：「《紅翼東飛》的前半部是紀實。從一九三二年一架孤單的蘇聯飛機飛到遠東來視察，直到一九三四年冬天，在嚴寒中有三百架紅翼飛機輸送到遠東，這差異的情形結束了小說的前三部」（同上）。可見連載版並沒有遵守「前半部是紀實」的順序，出版單行本時按原著作了調整和補充。

1939年6月，蘇聯影片《蘇日風雲》（原名《在邊境上》）在香港上映，編劇即為拍夫朗訶，《言林》特地刊發〈拍夫朗訶名作在港開映〉一文對此作了報導（1939）。拍夫朗訶的《紅翼東飛》是葉靈鳳在《言林》上的第一部翻譯作品，經由他對原著的修改而翻譯完成，體現出譯者的用心。這一用心貫穿於之後葉靈鳳在《言林》上的翻譯。另一部長篇連載小說《火線下》也不是原書的全文翻譯。《火線下》的作者巴比塞（Henri Barbusse, 1873–1935）是法國左翼作家，《火線：一個步兵班的日記》（*Le Feu, journal d'une escouade*）1916年發表，獲得了龔古爾文學獎（Le Prix Goncourt）。葉靈鳳在〈巴比塞的《火線下》〉一文中介紹道：「亨利·巴比塞的作品，譯成中文的有《地獄》，《光明》，短篇小說集，史太林傳：《從一個人看一個世界》。他的名字在中國文藝讀者的眼中，該是熟悉而且親切的。他不僅是一位偉大的

進步作家，同時也是一位勇敢文化戰士」(靈鳳 1940)。如葉靈鳳所言，在他翻譯《火線下》之前，巴比塞在中國已經是「熟悉而且親切的」。《地獄》(*L'Enfer*) (光華書局) 由成紹宗 1930 年翻譯出版，之後多次再版。《光明》(*Clarté*) (現代書局) 由敬隱漁 1930 年翻譯出版，1932 年出至三版。祝秀俠翻譯的《巴比塞短篇作》(大江書鋪) 1933 年出版。徐懋庸翻譯的《斯大林傳》(新知書店) 至 1940 年已出至七版。另有沈起予著《巴比塞評傳》(良友圖書公司 1933)、陸從道編《巴比塞選集》(群眾雜誌公司 1936) 等。巴比塞確實是中國讀者所熟悉和歡迎的作家。⁸

關於《火線下》的介紹和中譯，1917 年 *The China Press* (《大陸報》) 上刊登了 *WITH POILUS UNDER FIRE Daily Life Amid Bursting Shells as Described by Henri Barbusse*，用英文節錄了《火線下》的一段文字 (Barbusse 1917)。1919 年張崧年翻譯的《精神獨立宣言》(*Déclaration d'indépendance de l'esprit*) 對《火線下》作了介紹。1925 年羅黑芷、李青崖合譯《砲戰——〈火線之下〉二十四篇之一》在《小說月報》刊載 (巴比塞著，羅黑芷、李青崖譯 1925，1–16)。1932 年莫岡翻譯了《火線下》的第一章 (巴比塞著，莫岡譯 1932，194–199)。1933 年婁放飛譯出《火線下》的前兩章，《世界文庫》對婁放飛的譯本作了介紹，但未見全譯 (Barbusse, H. 著，婁放飛譯 1933；亨利巴比塞作，婁放飛譯 1936；Barbusse, H. 著，琴心譯 1933)。葉靈鳳對巴比塞也早有譯介，1928 年他翻譯發表了巴比塞的短篇小說《他們的路》(巴比塞 H. Barbusse 著，葉靈鳳譯 1928，123–129)。《立報·言林》則不只一次關注過巴比塞。1935 年巴比塞去世後，《言林》在創刊號上錄有巴比塞的一句話：「未來較之現在更重大，現在是緊跟著未來的，所以未來是現在的永遠的名字」(巴比塞 1935)。1940 年 5 月 17 日《言林》「文學日曆」欄專文紀念巴比塞的誕辰。⁹1940 年 9 月 21 日《言林》「國外文壇」欄刊出〈蘇聯熱烈紀念巴比塞逝世五週年〉的報導，再次紀念巴比塞。¹⁰

1940年《火線下》在《言林》刊載時，葉靈鳳說「全書已翻譯將竣」（靈鳳 1940），可是並不見翻譯全稿，《言林》連載的是《火線下》的最後五章。鄭可怡指出：小說「具體展示了無產階級革命中堅持『以戰抗戰』的主張，因著抗日戰爭的歷史語境，與民族主義主戰的傾向重合」（鄭可怡 2019a，155–195）。小說敘述的是一戰時期德法之間的慘烈戰爭，用第一人稱敘事。巴比塞加入了前線的戰鬥，小說寫出了他的親身經歷。戰壕裡的死亡、救護站的轟塌、遍佈可怕屍體的荒野、極度的疲乏……「我」的敘述具有紀實性。救護站中，「我」聽一位飛行員說道：

「我就在這時被炮彈片擊中了。當我飛得很低，聽出了混合為一的這發自地上的兩種聲音——『上帝保佑我們』！（原文作德語——譯者）以及『上帝保佑我們』！（原文作法語——譯者）——於是我就飛走了。」……

「試想！」他說，「試想這兩個相同的集團喊著這些相同的可是又相反的呼喊，這些相同的敵對的呼喊！仁愛的上帝不知對這一切作何感想？我深知上帝是無所不知，怕對這一切也毫無辦法。」（巴比塞著，葉靈鳳譯 1940）

德法兩國的軍人都在向上帝求救，上帝是唯一的，上帝該庇護誰？《舊約·創世紀》記錄了一個故事：人類的語言原是一樣的。人在建造城和塔，耶和華擔心人類合作，會無所不能。於是他變亂人的語言，使他們彼此不能溝通。戰爭或許與語言相關，翻譯是溝通的手段。葉靈鳳特地標註了原文語言，德語和法語兩種語言的同一表述可產生一種怪異效果，這種效果質疑了戰爭。「反戰」是《火線下》發出的強烈聲音，葉靈鳳說：「巴比塞並不是消極的，他明白的告訴他的同伴——兵士們，他們該運用另一個『戰爭』來消滅這戰爭」（靈鳳 1940）。葉靈鳳的翻譯一方面要讓中國讀者認識戰爭，另一方面是呼籲積極應戰。1940年葉靈鳳的散文集《忘憂草》在香港出版，其

中〈枕上斷想〉、〈「七七」斷想〉等篇提到巴比塞，引用了《火線下》的話，並分析道：「我們的民族解放戰爭雖然還未到結算的時刻，但從過去兩年的收穫看來，我們犧牲早已『值得』了」（葉靈鳳 1998，236–238）。

從《紅翼東飛》、《火線下》的翻譯已可知曉，葉靈鳳所選擇的翻譯作品具有現實意義。無論是對於抗戰中的中國還是二戰中的世界，這些譯作都提供了一種戰時氛圍和抗爭態度。被納入《自由文獻》的一系列「輯譯」就明顯體現出這一特點。葉靈鳳的「輯譯」是把編輯節錄的西文書或西人話譯成中文，或幾句，或幾段，在《言林》中帶有補白作用，但能體現出譯者和編者的用意。如《永不停止的戰爭》中道：「高高在最深的堡壘之上，我看見那光輝，不停的向圍困者和防禦者招呼，永遠鼓舞著這永不停止的戰爭——巍然站立的『自由』」（愛德華·卡本特著，豐選譯 1939）。葉靈鳳註明譯文出自卡本特 (Edward Carpenter, 1844–1929) 的《走向民主》。卡本特是英國詩人、社會主義活動家，他的身份和著作傾向符合葉靈鳳的輯譯標準。葉靈鳳《自由文獻》的輯譯讓世界各地的作者，在戰爭年代發出了對「自由」的共同呼聲。

卡本特、巴比塞等人都可以看成是二十世紀的文學家。《言林》中葉靈鳳選擇翻譯的作品大都具有「當代性」，這些作品被及時引入中國，讓中國讀者感受到一種強烈的世界感。翻譯使戰爭年代的中國不會顯得孤立。《告密者》的原作者是德國戲劇家布萊希特 (Bertolt Brecht, 1898–1956)，葉靈鳳介紹他是「當代德國戲劇家，同時也是詩人。自第一次大戰以後，他即以諷刺作品馳名。目前，不用說，他也是棄居在異國的一位德國流亡作家」（任訶 1940b）。布萊希特的劇作以「間離效果」(defamiliarization effect) 著稱，《告密者》即是一部表現出「間離效果」的劇作。作品只有丈夫、妻子、兒子、女仆四個角色，丈夫和妻子抱怨希特勒統治下的德國生活，他們懷疑兒子偷聽了他們的話會去告密，兩人極度緊張。結果兒子只是出門買糖

果，並沒有去告密。葉靈鳳用布萊希特的劇作來展現戰時德國民眾生活的糟糕景象，譯出的「間離效果」使這樣的展現客觀真實，以從另一方面鼓舞抗戰決心。

葉靈鳳翻譯的另一篇出自二戰軸心國作家的作品是意大利西龍（Ignazio Silone，今譯西龍尼，1900–1978）的中篇小說《狐》。西龍是著名的反法西斯作家，葉靈鳳說：「西龍所以被稱為最有才能的反法西斯作家，便是他有一種技術，能將反法西斯思想織入他的作品中，而絲毫無損於他作品的藝術性」（編者 1941）。《狐》的藝術性主要體現在隱喻修辭和故事結構方面。小說前半部分寫主人公達利爾等人對於法西斯威脅的緊張防禦，後半部分寫救治傷者的家庭故事，結尾驚異地揭示被救治的傷者就是那個令人緊張的法西斯威脅。小說開始處，達利爾設陷阱捕抓狐狸，一無所獲，結尾處狐狸終於落入陷阱，可達利爾的反法西斯組織卻遭到了嚴重破壞。小說道出了人性、政治、道德之間的深刻衝突，其中達利爾一家和傷者在庭院裡談論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的場景，尤為動人。葉靈鳳譯道：「除了無垠的天空之外，一切都是虛無，空泛，不真實的。除了它之外，什麼也不存在。但是甚至天空也並不存在。這兒只是和平與沉靜」（西龍著，林豐譯 1941）。以浩渺的天空俯瞰人間，所有一切，包括戰爭和殺戮都顯得十分無謂。身處尚未淪陷時的相對自由的香港來看世界大戰，確乎能產生某種浩渺之感。

2.2 《早戀》等譯作的文學取向

《滇緬路上》、《不認識的同志》、《關於契訶夫》等篇的翻譯也都具有現實性。滇緬路關係到英國戰時的對華政策，《立報》對此多有報導。如一日的頭版新聞〈英政府已決定滇緬路如期開放〉中說：「英國之遠東政策正趨向於重開滇緬路及益視中國為一兄弟盟邦。據悉，英政府現正考慮種種積極援助中國之措置，將於開放滇緬路同時和隨後付諸實現」（1940）。葉靈鳳翻譯報告文學《滇緬路上》便是

對中英時政關係的一種關注。而對高爾基 (Maxim Gorky, 1868–1936) 等蘇聯作家的譯介也反映出其時的中蘇關係。《言林》刊登有不少關於高爾基和蘇聯作家的文章，特別是《文協》第五十八期刊出〈高爾基逝世四週年紀念特輯〉(1940)，可見出中國左翼文壇對高爾基等蘇聯作家的推崇。「蘇聯文學翻譯在三四十年代的譯界佔據了壓倒一切的霸主地位。這與它得到了政黨的領導和支持，具有著其他國家文學的翻譯所無法比擬的優勢是分不開的，這本身也構成了蘇聯文學翻譯的一個顯著特徵」(李今 2005, 30)。葉靈鳳在《言林》發表有〈高爾基的一生〉(任訶 1940a)、〈一九四一年 蘇聯作家寫作計劃〉(任 1941) 等文呼應了當時文壇的取向。他的譯作《高爾基與音樂》、《關於契訶夫》等便也應譯界風尚而生。

《早戀》是蘇聯作家費雷爾曼 (Ruvim Frayerman, 1891–?) 的長篇小說。葉靈鳳翻譯這部小說既響應了其時中國文壇對蘇聯文學的看重，同時也表現出與《紅翼東飛》、《不認識的同志》等蘇聯小說不太相同的樣貌。《早戀》的主人公是幾位少年。丹雅與母親同住，她的父親從遠方歸來，卻已組建了新的家庭。父親的養子科爾亞和丹雅成了同學，丹雅一開始恨科爾亞，可不知不覺對他產生了好感，而男孩費爾卡始終追隨著丹雅。一場暴風雪，丹雅拼死救了科爾亞，卻被學校極大誤解，最後母親帶丹雅離開了這個地方。小說寫到紅軍、邊境守衛隊、少年先鋒組織，不過這些不能遮蓋小說對少男少女情感生活的細緻抒寫。小說敘述了一年間發生的故事，從夏天開始，到夏天結束，共二十二章，在《言林》連載了一百五十一天。小說最後敘道：「童年時代結束了！但是從什麼時候起的呢？誰能給他們解釋這個謎呢？和他們時常在一起的沙不能夠，森林不能夠，石頭也不能夠」(費雷爾曼著，葉靈鳳譯 1941)。筆調抒情，委婉動人。葉靈鳳論道：「費雷爾曼的這部小說，正如他所描寫的這新土地上的一群少年一樣，可說全然是一首新鮮活潑的散文詩。在傾向於風格樸素的蘇聯小說中，我們很少見到寫得這麼美麗的」(葉靈鳳

1941)。與《言林》上葉靈鳳翻譯的那些敘寫戰爭的作品不同，《早戀》更富有文學美感。

葉靈鳳提及，當《早戀》連載的時候，「上海就已經有了一個單行譯本出現，書名《少年伴侶》，朋友們寄了一本給我，我翻閱了一遍」（葉靈鳳 1941）。葉靈鳳的《早戀》1941年2月1日連載完畢，《少年伴侶》則由上海山城書店1940年11月初版，譯者是俞荻（1904-?）。《少年伴侶》翻譯了十五章，沒有譯完，因此葉靈鳳對這個譯本不以為然。不過1941年3月上海天光書店出版了由胡山源（1897-1988）翻譯的《早戀》，是二十二章的全譯本。另外1941年6月香港海燕書店出版了穆俊翻譯的《初戀》，也是二十二章，這本書被列為「國際文學譯叢3」。這幾部《早戀》發表出版的時間十分相近，可以對其中的具體譯文稍作比較。

以丹雅在暴風雪中救科爾亞的一段為例，這是小說最為精彩的段落。

他驚異的望著她。她的眼中似乎蘊蓄著有一點什麼，從她結了冰的睫毛下焦灼的望著他，一點他全然不能了解含有新的意義是什麼。駕著輕便雪橇的這些生猛的狗，似乎帶著他們穿過撲到他們臉上的冷冽的雪花，奔向他從未聽見過的什麼古怪的地方去。（費雷爾曼著，葉靈鳳譯 1940）

他駭然地凝視著她，在她的兩眼裏含著一些媚人的東西，從那凍結的睫毛之下熱切地望著他，好像一些神秘的東西赤裸地感動他，充滿著他所不能瞭解的新意義，那好像這些野性的狗兒輓起輕快的雪車，正在疾馳過那刺著它們的臉兒上的銳利的猛衝的雪花，到那他從來沒有到過的奇異的王國。（弗拉易爾曼著，俞荻譯 1940，139）

他驚異地看著她，在她的眼睛裏有著什麼東西，她的眼睛從它們凝霜的睫毛之下關心地望出來，看著他，而她眼睛裏的東西，則使他覺得這裏面充滿著他所不能探測出來的新意義。現在這些配在輕橇上的野狗好像使他們趕快穿過那些猛烈的打在面上的雪陣，到他們從未聽見過的異域去。（Ruvim Frayerman 著，胡山源譯 1941，139）

他駭然地看著她。在她的眼中，從它們的冰結了的睫毛下面關心地凝視著他的眼中有著某些東西，某些引起他注意的像充滿了他無法推測的一個新的意義的東西。它好像這些野蠻的狗一樣，駕著輕便的雪車，正在驅策著它們穿過這尖銳的，疾馳著的，刺痛著它們面孔的雪花，走向他從來沒有聽到過的某一個奇異的地方。（弗拉易爾曼著，穆俊譯 1941，153）

比較這四段譯文，葉靈鳳和胡山源的翻譯更為順暢貼切，表意更明了。特別是狗拉雪橇的那句話，葉靈鳳和胡山源的翻譯均以狗為主語，狗拉雪橇帶著兩位主人公迎雪奔跑。俞荻和穆俊的翻譯均以科爾亞的視點一意到底，雪花刺痛的是狗的面孔，而非人臉。葉靈鳳和胡山源都是文學家，俞荻和穆俊是翻譯家，文學家或許對修辭更為在意。葉靈鳳用「驚異」、「蘊蓄」、「焦灼」、「生猛」、「冷冽」、「古怪」等詞語十分確切地表現出了暴風雪中危險緊張的時刻和兩個孩子恐懼、抗爭、茫然的心理。

葉靈鳳的《早戀》譯自什麼文本？是俄文本嗎？其他三家的翻譯是否譯自不同的文本，因而中文翻譯有差異呢？葉靈鳳沒有交代文本來源，而胡山源在他譯本的序言中作了說明：「本篇小說是從《國際文學》（*International Literature*）一九四〇年一、二、三月號的英文譯出來的，在該號的『作者小誌』欄中，有關於本篇作者的幾句話，現在譯在這裏，以供參考」（胡山源 1941，6）。《國際文學》是蘇聯出版的一份月刊，有英、法、德、俄幾種文字的版本，英文版多有蘇聯文學的譯介。胡山源的《早戀》譯自英文版，其譯本的扉頁上註明，小說英文版 *Early Love* 與中文版同時印行，可惜未能查見。胡山源翻譯的「作者小誌」這樣介紹 Ruvim Frayerman：「拉維姆·夫雷雅曼（Ruvim Frayerman）是一個多才的年輕的蘇維埃長短篇小說家。他初次轟動蘇維埃讀者的，是他的 *Vassaka, Red Partisan*，這是一篇講到中國東三省革命青年的長篇小說，登在本刊一九三三年的第二號。本號中所發表的《早戀》，是他的第二部巨製。他的長短篇小說

的特點是富於抒情的語句和心理的分析」(同上, 6)。如果比較葉靈鳳對費雷爾曼的介紹, 就會發現和胡山源翻譯的「作者小誌」非常相似。《言林》上刊登的〈關於《早戀》的作者〉一文道:「羅菲姆·費雷爾曼, 蘇聯新小說家。他引起蘇聯的讀者注意的第一部作品是《赤衛游擊隊瓦希卡》, 一部關於滿洲革命青年的小說。這部近作《早戀》, 是他第二部的力作, 寫的是蘇聯少年先鋒隊自由活潑的生活。作者的小說文筆美麗, 以輕柔的抒情風味和精微的心理分析見稱」(1940)。¹¹在寫這段作者介紹時, 葉靈鳳可能加入了一點他閱讀《早戀》的體會。可以推測, 葉靈鳳的翻譯也來自於《國際文學》英文版。在《早戀》前一個月翻譯的《滇緬路上》便出自英文刊物《新作品》, 而葉靈鳳在上海時期翻譯的《新俄短篇小說集》就「完全是從英文轉譯來的」(靈鳳 1928, 13)。

穆俊《初戀》的作者介紹也和胡山源、葉靈鳳一致, 並且穆俊的譯本標明是「國際文學譯叢」, 也可推斷《初戀》同樣出自《國際文學》。而俞荻《少年伴侶》沒有相應的作者介紹, 但在書後的廣告頁中說明《少年伴侶》在蘇聯極受歡迎, 並提到「國際文學被選為第一篇小說, 譽為成功作」(弗拉易爾曼著, 俞荻譯 1940, 150)。《少年伴侶》只譯出十五章, 是否是因為 *Early Love* 於 1940 年在《國際文學》刊出, 《少年伴侶》不及譯完全文就急於在同年出版了呢? 如果這四種譯本都出自《國際文學》, 那麼也就不難解釋這四種譯本的發表出版時間為何那麼接近。葉靈鳳、胡山源等人看到了《國際文學》上的 *Early Love*, 都很欣賞, 於是不約而同地翻譯出來。《國際文學》雜誌, 內地的作者多有接觸, 並常有相關報道和翻譯文章,¹²在香港這類國際英文刊物更容易獲得。《言林》在葉靈鳳編輯時期, 就對《國際文學》有多篇報導。¹³總之, 上海出版的俞荻《少年伴侶》和胡山源《早戀》與香港發表出版的葉靈鳳《早戀》和穆俊《初戀》表現出了滬港兩地文學家、翻譯家共有的文學取向, 而香港因為這些文學家、翻譯家從內地的來到, 呼應了內地文壇, 同時促進了自身的文學發展。

(三) 翻譯與香港文壇的建設

主編《言林》的葉靈鳳為何要在《言林》上發表這麼多翻譯作品？如果僅從這些譯作本身來尋繹原因，當然不難找出一些答案。《紅翼東飛》、《火線下》等作品對嚴酷戰爭的正面敘寫，表現出反戰態度，同時堅定了「以戰抗戰」的決心。葉靈鳳翻譯這些作品，與現實的戰爭環境密切關聯，能起到激勵抗戰的積極作用。其二，《告密者》、《狐》等原作者是二十世紀「當代」著名作家，葉靈鳳翻譯他們的作品，讓戰時的中國感受到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團結。其三，對高爾基等蘇聯作家作品的青睞，是三四十年代中國文壇尤其是左翼文壇的取向。在「抗戰建國」的時代氛圍中，十月革命引導了中國革命的方向。第四，《早戀》等作品是出色的文學創作，它們進入翻譯家葉靈鳳的視野，使他不由得要行使譯者的責任，向中國讀者引介優秀的國外作品。這些原因都能促成葉靈鳳的翻譯，但僅此還不夠。除了這些譯作本身的價值以外，還需考慮的是「翻譯」的價值。葉靈鳳為何選擇「翻譯」作為他貢獻給《言林》的主要成績。

就此，王宏志為譯者研究提供的新思路很值得參考。他認為，應把「譯者作為文化現象」來看待。譯者「在特定的文化環境下參與、回應、協商以至影響一些重要文化問題，甚至是具體地對獨特文化問題作出回應」。由「譯者的角度去觀照社會和文化，從而得到更深邃的理解」（王宏志 2021，87-96）。這就為譯者研究提供了更寬闊、更有意義的視野。如果在「特定的文化環境下」來考察作為譯者的葉靈鳳，那麼對葉靈鳳在《言林》上的翻譯就不能僅局限於譯作本身。《言林》、《立報》、二戰以及葉靈鳳發表譯作時身處的香港都構成了「特定的文化環境」，由此來追蹤葉靈鳳從事翻譯的原因、辨析翻譯的意義，便可能「得到更深邃的理解」。

應看到，在《言林》上發表譯作的不是只有葉靈鳳。雖然葉靈鳳的翻譯是支撐《言林》的主幹，但還有徐遲、袁水拍、歌雷、林煥

平、張原松、黎國雄、一峰、友蘭等人發表了很多翻譯文章。例如袁水拍(1916–1982)翻譯《馬德里歌》刊載於《言林》的頭條。譯詩道：「我沒有了家，房屋，/我沒有了衣服和玩具。/我沒有歌聲，/只有馬德里我能活。/不相識的外國人和我們打仗，/說著一種我們不懂的語文。/為什麼他們來？/搶和殺人。/你瞧我快要下淚，/我遠離了母親。」袁水拍在按語中說：「此詩為一十三歲西班牙女孩所作，她家在阿拉貢，此刻流亡在法國」(阿格令娜·貢柴立茲著，袁水拍譯 1939)。這首詩強烈傳達出二戰時期受難民眾的心聲。又如一峰翻譯的英國著名記者J·伯特蘭的文章《新年為中國祝福》。文中道：「我們該看清的是，通過了戰爭的巨大的苦難和犧牲，有一個已經踏進自由門限的偉大國家湧現了。一個自由的中國等於全人類五分之一人口的自由。這也許是可以領導我們免去世界大戰及其慘禍的目前唯一可能的而且是最易走得通的途徑」(J·伯特蘭著，一峰譯 1941)。這篇譯文也刊於《言林》頭條，佔據這期《言林》的主要篇幅，文章觀點無疑鼓舞了人心。而在英屬殖民地的香港刊發由英國記者寫的對中國充滿期待的文章，在某種程度上傳達出二戰期間港英政府對中國的態度。只要不違犯港英利益，激進的言論可以通過一些方式在香港得到傳播。翻譯便是一種十分有效的方式。

《言林》不僅刊登大量翻譯文章，還發表了專門討論「翻譯」的文章，如鄭郁郎〈翻譯問答〉、〈翻譯再商榷〉，袁水拍〈翻譯的「一窩蜂」——讀〈愛國者〉〉等。鄭郁郎是著名翻譯家，六十年代擔任《星島日報》總編，是香港公共關係學的推動者，他關於「翻譯」的文章主要分析糾正了某報紙上刊登的英國前海相古柏的演說詞的譯文。演說詞中“All the British government received in return for its ‘sweet reasonableness’ was the Berchtesgaden ultimatum...”其中“sweet reasonableness”被譯為「甜蜜的理性」，鄭郁郎認為應譯成「動聽的公正」。鄭郁郎談這個例子「是想大家注意翻譯整個問題和報章譯文的改善」(鄭郁郎 1938b)，「翻譯不是機械工作；字典是一件死東

西，要譯者運用思想」(鄭郁郎 1938a)。在香港，「報章譯文」是較為常見的文體，港英政府管制下的香港中文刊物要刊登政府的指令、新聞、信息等，就會涉及到翻譯。所以翻譯在香港的報刊上十分常見，因為常見，問題就較多，於是翻譯家鄭郁郎想改善「報章譯文」。他在《言林》上談這個問題，也是因為《言林》對翻譯的看重。

袁水拍〈翻譯的「一窩蜂」——讀《愛國者》〉針對的是賽珍珠(Pearl S. Buck, 1892–1973)的小說《愛國者》，這部小說於1939年6月出了三個中譯本。袁水拍在文中稱賽珍珠為「勃克太太」，他認為「勃克太太」的《愛國者》寫中國革命不符合事實，「中國的翻譯界似不必『一窩蜂』地捧了一雙曾蒙洋人欣賞的小腳，顧影自憐，把『賣野人頭』賣給自家了」(袁水拍 1939)。《愛國者》中譯本出版，即刻引起不少爭議，巴金就在《魯迅風》等刊物上發表文章，表達他的「憤怒」(巴金 1939)。¹⁴ 袁水拍也否定了這部小說，認為不應該翻譯。葉靈鳳在《言林》發表過〈賽珍珠新著：《中國小說論》〉等文(訶 1939)，¹⁵ 很推舉賽珍珠。但他用頭條刊發袁水拍的文章，表明也十分認可袁水拍的觀點。翻譯不必「一窩蜂」，翻譯要首先明確被譯作品在中國是否有價值。這篇頭條文章，明顯呼應了內地的爭論。

翻譯什麼作品、如何翻譯以及與內地相呼應，是葉靈鳳編輯《言林》時思考翻譯的三個問題。他翻譯《紅翼東飛》等作品，縱然也是因為戰事紛擾，他在香港諸事繁雜，無暇安靜創作，故以翻譯來補缺，但他的翻譯並不是隨意的。要在香港刊物的眾多「報章譯文」中顯出特色，葉靈鳳有他的考量。正如《紅翼東飛》引入蘇聯作品、敘寫戰爭，是中國文壇需要的。而在翻譯時挪移小說前後段落，吸引報紙讀者，也是翻譯的一種技巧。在香港連載四個月後，《紅翼東飛》即在重慶出版單行本，可見與內地的密切聯繫。本雅明(Walter Benjamin, 1892–1940)論譯者時說道：「文學作品的精髓是某種深不可測的、神秘的、『詩意的』東西；翻譯家若要再現這種東西，自己必須也是一個詩人」(本雅明著，張旭東譯 2014)。¹⁶ 葉靈鳳既是翻譯

家，更是文學家，在這點上他具備了本雅明要求的優秀翻譯家的素質。作為文學家的葉靈鳳，他的翻譯能起到超越翻譯本身的作用。如果考慮到《言林》刊載文字的三類題材內容，國內、香港本地、國外，那麼翻譯可以溝通這三者，國外作品的引入呼應了內地文壇，並與香港本地文學的建設連在一起。

三十年代香港文壇並不與內地文壇同步。葉靈鳳等內地文學家南下之前，香港文壇還由舊體文學、通俗小說據佔，新文學並不如內地一樣是文壇主流。盧瑋鑾認為，1927年魯迅到香港演講，對香港文壇產生了影響，「因此就以一九二七年為起點。新文學自荒涼的小島上開始萌發，其間困難障礙甚多，一直到一九三七年『七七盧溝橋事變』，本港新文學才到達一個高潮」（盧瑋鑾 1987a，9）。盧瑋鑾談的「高潮」是隨著全面抗戰爆發，大批內地作家到香港避居帶來的。陳智德則進一步指出：「抗戰爆發前十年，香港經歷一段『新文藝大爆炸』時期，不單每年都有一本新的文學雜誌創刊，作家之間也建立了不同的團體。」「因此當抗戰爆發後，內地多個城市相繼淪陷，內地作家轉移至香港繼續抗戰文學工作時，所面對的實在不是一片空白的文化環境，而是有本身文化軌跡的城市，新文學發展了至少十年，報刊有固有的獨立言論傳統，亦有充足的讀者群，這些都是抗戰期間香港接續和支援抗戰文藝工作的基本」（陳智德 2018，28）。香港新文學在1937年之前已有不少聲色，但主要依靠的是本港青年作家的努力，與內地新文學還存在隔膜。內地作家南來，讓新文學徹底融入香港文壇，對香港文學發展產生深遠影響。香港《立報·言林》便行使了這樣的歷史功能。

在香港《立報》第二號上，發行人薩空了在《小茶館》副刊寫了〈建立新文化中心〉一文，這篇文章是談論戰時香港文學的名文。文章先說：「到香港常常聽到許多新朋友恭維上海是中國文化的中心」，但現在「上海人一擁而來，到香港十幾萬，這大量的移民，自然要影響了香港」。接著舉坐車找零錢的例子說明影響所在，上海的「中心」

已然「破碎了」。而「文化中心的形成，多半是人為的」，香港代替了上海，「今後中國文化的中心，至少將有一個時期要屬香港」。最後呼籲，在香港的「外江佬」和「本地的同胞」不應想著地域的區別，「而應當為中國的將來想」，「速起來為建設這新的文化中心而努力」（了了 1938）。建設「新的文化中心」是內地作家南來香港的壯志。這個「新」可以有兩解，一是香港的文化在抗戰之前並不繁榮，甚至被認為是「沙漠」，而北京、上海等城市被日本攻佔，失去「文化中心」的位置，香港成為「中心」乃是「新」出現的。二是這個「新」可以理解為「新文化」，隨著大批作家南來，香港在戰時成為新文學家新的聚集地，成為新文化和新文學的一個中心。薩空了、茅盾、葉靈鳳等人來到香港，為香港帶來了名副其實的新文學。

《言林》對於新文學在香港的開展起到不容忽視的作用。「文協」香港分會的會刊《文協》在《言林》定期刊發，與內地「文協」總會保持緊密聯繫，成為戰時新文學和新文化的重要一脈。《言林》經常報導內地文壇消息，如1940年7月29日的「文壇動態」刊發〈江南成立火線文藝社〉、〈老舍擬寫張自忠烈士〉的報導。內地刊物出版、社團活動、新文學家行跡等都在《言林》得到及時呈現。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言林》對魯迅的紀念。1938年到1940年，每年的10月19日《言林》都刊發魯迅紀念專號，而與魯迅相關的訊息總能時見報導，如1940年8月3日的魯迅專刊〈魯迅紀念簡訊〉發佈消息道：「自今日起，一連三天，文協，漫協，木協三團體聯會」，「舉行魯迅紀念木刻展覽會」（1940）。在香港紀念魯迅、談論魯迅，無疑是新文學深入香港的最好證明。須知葉靈鳳在上海時與魯迅有過不小的過節，他編輯《言林》，刊發大量的魯迅紀念文章，可知葉靈鳳已轉變了年輕氣盛時期對魯迅的看法，香港時期的他是以新文學家的愛國立場來延續新文學的傳統。另如1939年11月15日〈為援助葉紫先生遺族募捐啟事〉、1940年3月24日〈蔡子民先生追悼會特刊〉等等，均可說明新文學家葉靈鳳編輯的《言林》既呼應內地文壇，同時也面向香港文壇，使香港文壇對新文學和新文化作出聲應。

由此來看《言林》的翻譯，便可與新文學、新文化銜接起來。翻譯理論家韋努蒂 (Lawrence Venuti, 1953-) 認為：「在殖民地的從屬次要文化中，也許翻譯所能帶來的最具深遠意義的變革，就出現在它能引入新觀念與新範式，尤其是那些能促使古代傳統轉型為現代時空觀念、自我與國家的觀念與範式，不論是口頭的抑或是文學的」(勞倫斯·韋努蒂著，蔣童譯 2019，278)。晚清中國淪為半殖民地，而翻譯為中國帶來的「觀念與範式」的巨大轉變已毋庸置疑。王宏志論道：「以翻譯來衝擊原來文學/文化系統、協助建立新系統的做法，一直延續到『五四』以至 1930 年代。可以想像，『五四』以後翻譯的衝擊力量比晚清時期是強大得多。主要原因在於，『五四』作為新文化和新文學運動，是以打破傳統建制為主要目標，而當時的倡議者也一直嘗試建立新的文化和文學系統」(王宏志 2007，50)。翻譯對中國現代文學及新文學的建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而三十年代的香港，作為英屬殖民地，葉靈鳳等南來的新文學家要在此拓出局面，同樣需要藉助新文學建設時期的有力手段——翻譯。以翻譯來對抗其時香港文壇的舊體文學、通俗文藝，「衝擊原來文學/文化系統」，從而建設「新的文化中心」。所以葉靈鳳的翻譯是從不同文體全面入手的，他幾乎不寫詩歌和劇本，但翻譯撒米爾·邦福特《獄中寄妻》、傑姆·康奈爾《叛逆的歌》等詩歌，充滿了鬥爭的勇氣，翻譯布萊希特的戲劇《告密者》則獨見深意。他翻譯高爾基的散文《關於契訶夫》不僅因為高爾基在三四十年代中國文壇享有崇高地位，還因為契訶夫在二十年代初新文學建設時期已影響廣泛。¹⁷同樣，他翻譯巴比塞的小說《火線下》，也是因為巴比塞已於「五四」時期，在《新青年》、《新潮》、《小說月報》等刊物被張崧年、茅盾、趙景深、劉延陵等人譯介入新文學。可以說，葉靈鳳的翻譯照應了新文學建設時期對西方作家和文學翻譯的倚重。在香港建設新文學和「新的文化中心」，同樣需要翻譯來助力。《言林》上惹人注目的優秀譯作《早戀》，其動人的情感和適恰的修辭，無疑成為了新文學創作的示範，呈示給了香港文壇。

葉靈鳳的這些翻譯，有助於香港新文學的建設。但正如陳國球指出：「香港作為文化空間，無論是自覺的或是不自覺的，往往被塑造成中國內地的延伸。」「及至戰火在中國大地蔓延，各方文化人如潮湧至；內地政治與文化的勢力填滿香港的公共空間，一時間將之改裝成全國的廣播台」（陳國球 2016，165–166）。南來文人將香港作為一個據點，延續內地的工作，繼續抗戰文學的創作與宣傳。茅盾、薩空了等人只是香港的過客，他們來來往往，在香港從事文學活動並不是為了建設「香港文學」。然而這些新文學家的到來，畢竟活躍了香港文壇，即便是「副作用」，也對香港文學與文化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不過，就《言林》來看，對「香港」乃有專門關注。例如編排「香港的一日」特輯（編者 1938），¹⁸參與香港「反新式風花雪月」的論爭，¹⁹刊發〈談香港戲劇運動的新方向〉（殊倫 1940）、〈「香港風」〉（黃布 1940）、〈對香港「青文運」的意見〉（尚英、何許 1940）等文章。對於這些關注香港文壇的文章，葉靈鳳在〈歲尾編餘〉發表感言，認為香港的「青年工作者若能本著適應環境的沉著作風做下去，則前途的燦爛卻是可以斷言的。言林對這方面願意隨時貢獻出狹小的篇幅」（1940）。因此，香港本地題材的文章和香港本地作家的寫作也是《言林》的重要構成部分。

葉靈鳳在《言林》上發表有不少關於香港的文字。他接編《言林》不久就寫了〈兩世界〉一文，認為香港這塊「樂土」的氣候「還像春天，另一些地方早已是『嚴冬』了」（靈鳳 1939a）。這是初到香港的感受，很快葉靈鳳便在這塊土地上用心工作，組建團體、編輯刊物、撰寫文章、翻譯作品、收藏圖書……葉靈鳳把他的後半生傾注在了香港。這是他與茅盾等南來作家的不同之處，抗戰時他來到香港，之後幾乎沒有離開過。不僅如此，葉靈鳳還以他後半生的大量心力研究香港史地，出版《香港方物志》、《香江舊事》等著作，「在香港歷史掌故方面成為權威」（王宏志 2000，40–69）。以這樣的身份來回看葉靈鳳編輯《立報·言林》時發表的《紅翼東飛》、《早戀》等譯作，也就與香港這塊土地、香港的文學歷史融合在了一起。

注 釋

- 1 成舍我到台灣後，於1988年7月12日創辦《台灣立報》，可見成舍我對於《立報》的情牽不捨。2014年4月《台灣立報》休刊，「人民網」轉載了「中國台灣網」的報導〈《台灣立報》休刊 臨別呼籲清醒的力量〉。
- 2 《立報》大部分為四個版面，也有超過四版的情況。如1936年3月增出《立報晚刊》，1936年6月出刊六版，1939年1月至8月為八個版面。
- 3 對《立報》研究的專著有李時新（2012），論文有李時新（2011）、李磊（2009）、陳龍（2017）等。這些研究大都集中於1935年至1937年上海時期的《立報》，個別研究論及1945年之後的《立報》。
- 4 此書有兩章分別論述《立報》的兩個副刊：「抗戰時期南來香港文化人的國家想象與在地關懷——薩空了主編香港《立報》『小茶館』副刊的個案」、「文藝與抗戰——葉靈鳳主編香港《立報·言林》的側面觀察」。
- 5 鄺可怡對葉靈鳳及《言林》的研究，可參見鄺可怡（2018a，2018b，2019a，2019b）。
- 6 出自魯迅〈革命咖啡店〉一文。1928年8月13日《語絲》第4卷第33期郁達夫〈革命廣告〉後的〈魯迅附記〉一文，收入《三閒集》時改名〈革命咖啡店〉。文中道：「革命文學家，要年青貌美，齒白唇紅，如潘漢年葉靈鳳輩，這才是天生的文豪，樂園的材料」（魯迅2005）。「魯迅文中的這段話使葉靈鳳自年輕時就戴上了『齒白唇紅』這頂帽子，且一戴數十年，成了葉靈鳳的『招牌』」（李克2018，189）。葉靈鳳年輕時和魯迅多有過節，但從他編輯《言林》多刊載魯迅紀念文章，便可看出葉靈鳳後來完全轉變了年輕時對魯迅的態度。
- 7 巴甫連柯在中國受到較多關注要到1940年代後期至1950年代初，主要因為他編劇的電影《宣誓》（1946年）、《斯維爾德洛夫》（1940年，中國1951年譯製）、《攻克柏林》（1950年）上映，另有長篇小說《幸福》等，在中國受到歡迎。周立波〈憶巴甫柯〉（《中國語文》1955年版）、劉白羽〈會見巴甫連柯〉（《莫斯科訪問記》1960年版）等文都對巴甫連柯表達了敬意。
- 8 張崧年在其翻譯的《精神獨立宣言》中對巴比塞及其作品作了較為詳細的介紹，這是對巴比塞的較早引介。見張崧年譯（1919a，1919b）。接著茅盾的《巴比塞的小說〈復仇〉》（雁冰1920）等是對巴比塞作品的較早翻譯。1920年代《小說月報》發表了茅盾、趙景深、劉延陵等人對巴比塞的評論和翻譯作品。周瘦鵑在1921年《禮拜六》上翻譯了十篇巴比塞的短篇小說。1935年巴比塞去世，《大公報（天津）》、《清華周刊》、《質文》、《國文週報》、《世界晨報》、《The China Press》等都發文或刊登照片紀念巴比塞。
- 9 文中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正瘋狂地展開的今天，逢到他誕生六十七年紀念日，真使人不勝感慨。」

- 10 其中編者按道：「巴比塞的《火線下》曾由葉靈鳳譯出一部分，在本欄連載。聞現已全部翻譯完竣，單行本不日將由大時代書局出版。」葉靈鳳主編《言林》，發表這段按語應是不虛。但《火線下》的全譯本未見出版。
- 11 此文未署名，但可以肯定是葉靈鳳執筆。
- 12 《國際文學》對於三四十年代中國內地文壇，並不陌生。如上海《出版消息》1933年第24期有〈國際文學三期到滬〉的報導。上海《譯叢周刊》(*The Weekly Digest*) 1939年第51期上刊有 *Spain's Tempering* (《鍛冶》) 標明來自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桂林《詩》1940年第2期上有〈瑪耶可夫斯基逝世十週年紀念在蘇聯〉，譯自《國際文學》英文版。重慶《中蘇文化雜誌》1941年第2-3合期上就有〈宋慶齡致《國際文學》編輯部的信〉，譯自《國際文學》1941年2月號。
- 13 《言林》對《國際文學》的報導多集中於1940年，恰是《早戀》連載的時候。如〈文藝情報 蘇聯《國際文學》月刊將編印中國抗戰文藝專號〉(1940)、訶(1940)、國際文學編委會(1940)。由這些報導可知，「文協」與《國際文學》有較好的聯繫與合作。
- 14 文中巴金說：「因此作為一個中國人我對《愛國者》的翻譯者便不能不憤怒地叫出：『我控訴』。」
- 15 《言林》多次刊載與賽珍珠有關的報導，如友蘭(1940)。
- 16 “But do we not generally regard that which lies beyond communication in a literary work—and even a poor translator will admit that this is its essential substance—as the unfathomable, the mysterious, the ‘poetic’? And is this not something that a translator can reproduce only if he is also—a poet?” (Benjamin 1996)
- 17 契訶夫在1920年代初對中國文壇已產生廣泛影響。如魯迅〈阿爾志跋綏夫〉(《小說月報》1921年第12卷號外「俄國文學研究」)，周作人〈文學上的俄國與中國〉(《新青年》1921年第8卷第5期)，沈雁冰、鄭振鐸〈現代世界文學者傳略(三)〉(《小說月報》1924年第15卷第3期)，馮至〈夢及夢之前後——與羨季哥的一封信〉(《文藝周刊》1924年6月第37期)等文中均提及契訶夫。契訶夫的作品也被大量翻譯，如耿濟之譯《櫻桃園》(商務印書館1921年)、《萬尼亞叔叔》(商務印書館1921年)、《柴霍甫短篇小說集》(商務印書館1923年)，鄭振鐸譯《海鷗》(商務印書館1921年)，胡適譯《洛斯基爾的提琴》(《努力週報》1923年第64期)、《苦惱》(《現代評論》1925年第1卷第6期)等等。
- 18 1940年10月31日，《言林》刊發了兩篇文章，李一飛〈漁村的一天〉和淋漓〈突圍——公煙分銷處一瞥〉。
- 19 相關文章有：陳善文(1940)、麥烽(1940)、張乙帆(1940)、曾潔孺、麥烽(1940)。

參考文獻

- 阿格令娜·貢柴立茲著，袁水拍譯（1939）。〈馬德里歌〉。《立報》，1939年10月24日，第2版。
- 愛德華·卡本特著，豐選譯（1939）。〈自由文獻 永不停止的戰爭〉。《立報》，1939年10月14日，第2版。
- 巴比塞（1935）。〈作家語錄〉。《立報》，1935年9月20日，第2版。
- 巴比塞著，羅黑芷、李青崖譯（1925）。〈砲戰（*Bombardement*）——《火線之下》二十四篇之一〉。《小說月報》，第16卷第7期，頁1-16。
- 巴比塞著，莫岡譯（1932）。〈火線下〉。《新地月刊》，1932年第4、5期合刊，頁194-199。
- 巴比塞 H. Barbusse 著，葉靈鳳譯（1928）。〈他們的路〉。《戈壁》，第1卷第4期，頁123-129。
- 巴比塞著，葉靈鳳譯（1940）。〈火線下（五十二）〉。《立報》，1940年4月19日，第2版。
- 巴比塞 Barbusse, H. 著，婁放飛譯（1933）。〈火線下——或分隊士兵日記〉。《中華月報》，1933年第4期，頁C.1-C.2；1933年第5期，頁C.5-C.8。
- 巴比塞 Barbusse, H. 著，琴心譯（1933）。〈火線下〉第二篇。《中華月報》，第1卷第7期，頁C.12-C.14；第9期，頁C.3-C.5。
- 巴金（1939）。〈關於《愛國者》〉。《魯迅風》，1939年第17期；《中學生》，1939年第6期；《現實》，1939年第2期。
- 本雅明著，張旭東譯（2014）。〈譯作者的任務——波德萊爾《巴黎風光》譯者導言〉。漢娜·阿倫特編，張旭東、王斑譯，《啟迪：本雅明文選》。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頁81-94。
- 編者（1938）。〈「香港的一日」特輯〉。《立報》，1940年10月31日，第2版。
- （1941）。〈《狐》的介紹〉。《立報》，1941年5月11日，第2版。
- 陳國球（2016）。〈文學評論與「畸形香港」的文化空間——《香港文學大系1919-1949·評論卷一》導言〉。陳國球，《香港的抒情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頁149-191。
- 陳龍（2017）。〈薩空了與《立報》的轉向——兼論報人政治立場對於報刊發展的影響〉。《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3期。
- 陳善文（1940）。〈抒情與人生〉。《立報》，1940年11月21日，第2版。
- 陳智德（2016）。〈導言〉。陳智德，《香港文學大系一九一九—一九四九·文學史料卷》。香港：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頁43-82。

- (2018)。《板蕩時代的抒情：抗戰時期的香港與文學》。香港：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 樊善標 (2019)。《諦聽雜音：報紙副刊與香港文學生產 (1930–1960 年代)》。北京：中華書局。
- 弗拉易爾曼著，穆俊譯 (1941)。《初戀》。香港：海燕書店。
- 弗拉易爾曼著，俞荻譯 (1940)。《少年伴侶》。上海：山城書店。
- 費雷爾曼著，葉靈鳳譯 (1940)。〈早戀 (一一二)〉。《立報》，1940 年 12 月 19 日，第 2 版。
- (1941)。〈早戀 (一五〇)〉。《立報》，1941 年 1 月 31 日，第 2 版。
- 〈關於《早戀》的作者〉。《立報》，1940 年 8 月 21 日，第 2 版。
- 國際文學編委會 (1940)。〈蘇聯《國際文學》編委會的一封信〉。《立報》，1940 年 12 月 10 日，第 2 版。
- 訶 (1939)。〈海外文壇 賽珍珠新著《中國小說論》〉。《立報》，1939 年 11 月 3 日，第 2 版。
- (1940)。〈文化報導 蘇聯《國際文學》月刊擬出中國專號〉。《立報》，1940 年 9 月 14 日，第 2 版。
- 亨利巴比塞著，婁放飛譯 (1936)。〈火線下〉。《世界文庫 第二年革新計劃》。上海：生活書店，頁 12。
- 胡山源 (1941)。〈譯者序〉。Ruvim Frayerman 著，胡山源譯，《早戀》。上海：天光書店。
- 黃布 (1940)。〈「香港風」〉。《立報》，1940 年 9 月 21 日，第 2 版。
- J·伯特蘭著，一峰譯 (1941)。〈新年為中國祝福〉。《立報》，1941 年 1 月 3 日，第 2 版。
- 鄭可怡 (2018a)。〈抗日戰爭語境與西方文學資源 —— 論葉靈鳳主編《立報·言林》及《紅翼東飛》的翻譯〉。《「『跨』與『轉』：現當代華語文學文化的遺產、變革與現代性」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頁 63–82。
- (2018b)。〈超越國界 —— 戰爭語境下《立報·言林》的「內在抵制」與《紅翼東飛》的翻譯〉。《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中國文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香港：香港恆生大學中文系及大中華研究中心。
- (2019a)。〈跨越歐亞戰爭語境的左翼國際主義：論巴比塞《火線》及葉靈鳳的中文翻譯〉。《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 69 期 (7 月)，頁 155–195。
- (2019b)。〈政治審查與文學生產 —— 論葉靈鳳主編《立報·言林》的抗戰文藝和翻譯〉。《「在地姻緣：香港文學及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香港：香港大學中文學院，頁 1–22。
- 勞倫斯·韋努蒂著，蔣童譯 (2019)。《翻譯之恥：走向差異倫理》。北京：商務印書館。

- 李廣宇(2003)。《葉靈鳳傳》。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
- 黎國雄譯(1941)。〈托爾斯泰的兩個兒童短劇〉。《立報·言林》，1941年4月1日，第2版。
- 李今(2005)。《三四十年代蘇俄漢譯文學論》。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 李克(2018)。《魯迅與那個時代的戰爭》。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 李磊(2009)。〈成舍我「二元化」辦報思想初探——對上海《立報》發刊辭的解讀〉。《現代傳播》，2009年第5期。
- 李時新(2011)。〈1946年上海《立報》改組探因——澄清《立報》晚期的一段史實〉。《新聞知識》，2011年第12期。
- (2012)。《上海〈立報〉史研究(1935-1937)》。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 了了(1938)。〈建立新文化中心〉。《立報》，1938年4月2日，第4版。
- 林林(1939)。〈無章的詩話(中)〉。《立報》，1939年1月7日，第2版。
- 靈鳳(1928)。〈新俄的短篇小說〉。葉靈鳳譯，《新俄短篇小說集》。上海：光華書局。
- (1939a)。〈兩世界〉。《立報》，1939年1月16日，第2版。
- (1939b)。〈日蘇戰爭與拍夫朗訶的《紅翼東飛》(上)〉。《立報》，1939年2月27日，第2版。
- (1939c)。〈日蘇戰爭與拍夫朗訶的《紅翼東飛》(下)〉。《立報》，1939年2月28日，第2版。
- (1940)。〈巴比塞的《火線下》〉。《立報》，1940年2月22日，第2版。
- 劉艷鳳(2009)。〈解讀上海《立報》發行上的「神話紀錄」〉。《國際新聞界》，第8期(8月)，頁116-120。
- 盧瑋鑾(1987a)。〈香港早期新文學發展初探〉。盧瑋鑾，《香港文縱》。香港：華漢文化事業公司，頁9-19。
- (1987b)。〈茅盾在香港的活動(一九三八—一九四二)〉。盧瑋鑾，《香港文縱》。香港：華漢文化事業公司，頁143-161。
- 魯迅(2005)。〈革命咖啡店〉。《魯迅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頁117-120。
- 〈魯迅紀念簡訊〉。《立報》，1940年8月3日，第2版。
- 馬光仁(1996)。《上海新聞史(1850-1949)》。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 麥烽(1940)。〈正視這個挑戰——關於「反新式風花雪月」的二三意見〉。《立報》，1940年11月23日，第2版。

茅盾(1938)。〈獻詞〉。《立報》，1938年4月1日，第2版。

慕容羽軍(2013)。〈葉靈鳳融入香港〉。方寬烈，《鳳兮鳳兮葉靈鳳》。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頁83–87。

〈拍夫朗訶名作在港開映〉。《立報》，1939年6月12日，第5版。

拍夫朗訶著，葉靈鳳譯(1939a)。〈紅翼東飛(一)〉。《立報》，1939年3月1日，第2版。

——(1939b)。〈紅翼東飛(二二九)〉。《立報》，1939年11月9日，第2版。

——(1939c)。〈紅翼東飛(二三七)〉。《立報》，1939年11月17日，第2版。

任(1941)。〈一九四一年蘇聯作家寫作計劃〉。《立報》，1941年3月25日，第2版。

任訶(1940a)。〈高爾基的一生〉。《立報》，1940年6月18日，第2版。

——(1940b)。〈關於原作者〉。《立報》，1940年7月25日，第2版。

Ruvim Frayerman 著，胡山源譯(1941)。《早戀》。上海：天光書店。

薩空了(1985)。〈我與《立報》六、創辦香港《立報》〉。《新聞與傳播研究》，第1期(1月)，頁28–38。

尚英、何許(1940)。〈對香港「青文運」的意見〉。《立報》，1940年12月31日，第2版。

〈少年伴侶〉廣告。弗拉易爾曼著，俞荻譯(1940)，《少年伴侶》。上海：山城書店。

殊倫(1940)。〈談香港戲劇運動的新方向〉。《立報》，1940年6月7日，第2版。

絲韋(2017)。〈葉靈鳳的後半生〉。陳智德，《香港當代作家作品選集·葉靈鳳卷》。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頁442–450。

〈歲尾編餘〉。《立報》，1940年12月31日，第2版。

王宏志(2000)。〈葉靈鳳的香港故事〉。《中外文學》，第28卷第10期(3月)，頁40–69。

——(2007)。《重釋「信、達、雅」——20世紀中國翻譯研究》。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

——(2021)。〈作為文化現象的譯者：譯者研究的一個切入點〉。《長江學術》，第69期(1月)，頁87–96。

〈文協第五十八期高爾基逝世四週年紀念特輯〉。《立報》，1940年6月18日，第2版。

〈文藝情報蘇聯《國際文學》月刊將編印中國抗戰文藝專號〉。《立報》，1940年3月9日，第2版。

西龍著，林豐譯(1941)。〈狐(十六)〉。《立報》，1941年5月27日，第2版。

謝六逸(1935)。〈開場白〉。《立報》，1935年9月20日，第2版。

雁冰(1920)。〈巴比塞的小說《復仇》〉。《解放與改造》，1920年第14期，頁62–66。

- 葉靈鳳 (1939a)。〈編者啟事〉。《立報》，1939年1月7日，第2版。
- (1939b)。〈留港文藝工作者的責任——遙祝文協總會一週年紀念〉。《立報》，1939年3月26日，第2版。
- (1941)。〈譯者附記〉。《立報》，1941年2月1日，第2版。
- (1998)。〈「七七」斷想〉。陳子善，《忘憂草——葉靈鳳隨筆合集之一》。上海：文匯出版社，頁236–238。
- 〈英政府已決定滇緬路如期開放〉。《立報》，1940年10月4日，第1版。
- 友蘭 (1940)。〈西書介紹 賽珍珠夫人在十月份《亞細亞》批評幾本中美關係的新書據說都值得一讀〉。《立報·言林》，1940年10月。
- 譯 (1941)。〈時代常識大寶庫 一百個有趣的問答〉。《立報·言林》，1941年4月5日至1941年4月15日，第2版。
- 袁水拍 (1939)。〈翻譯的「一窩蜂」——讀《愛國者》〉。《立報》，1939年7月9日，第2版。
- 曾潔孺、麥烽 (1940)。〈兩封信〉。《立報》，1940年11月26日，第2版。
- 張崧年譯 (1919a)。〈精神獨立宣言 (Déclaration d'indépendance de l'esprit)〉。《新青年》，1919年第7卷第1期，頁30–48。
- (1919b)。〈精神獨立宣言 (Déclaration d'indépendance de l'esprit)〉。《新潮》，1919年第2卷第2期，頁374–394。
- 張乙帆 (1940)。〈關於論爭〉。《立報》，1940年11月24日，第2版。
- 趙稀方 (2019)。《報刊香港：歷史語境與文學場域》。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 鄭郁郎 (1938a)。〈翻譯答問〉。《立報》，1938年10月28日，第2版。
- (1938b)。〈翻譯再商榷〉。《立報》，1938年11月14日，第2版。
- Barbusse, Henri (1917). "WITH POILUS UNDER FIRE Daily Life Amid Bursting Shells as Described by Henri Barbusse." *The China Press*, 25 October 1917, p. 4.
- Benjamin, Walter (1996).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 In *Walter Benjamin: Selected Writings Volume 1 1913–1926*, ed. by Marcus Bullock, and Michael W. Jennings, 253–263.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